

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00

(上)

ZHONGGUO XIANDAI WENXUESHI

朱栋霖 朱晓进 龙泉明 主编

以「人」的观念嬗演中国现代文学史进程

重新遴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典

重新阐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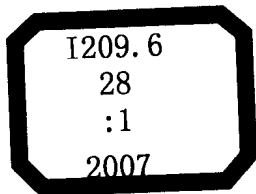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00 (F)

ZHONGGUO XIANDAI WENXUESHI



朱栋霖 朱晓进 龙泉明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00(上)/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ISBN 978-7-301-11204-5

I. 中… II. ①朱…②朱…③龙… III. 现代文学—文学史—中国—
1917—2000—高等学校—教材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9027 号

书 名: 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00(上)
著作责任者: 朱栋霖 朱晓进 龙泉明 主编
责任编辑: 张雅秋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1204-5/I·083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2.75 印张 397 千字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上 册

- 导 言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1
- 第一章 五四文学革命/8
 - 第一节 五四文学革命/8
 - 第二节 五四文学思潮与论争/12
 - 第三节 新文学社团流派/17
- 第二章 20年代小说(一)/22
 - 第一节 20年代小说概述/22
 - 第二节 叶绍钧 许地山/30
 - 第三节 郁达夫/33
- 第三章 20年代小说(二)/39
 - 第一节 鲁迅的文学创作/39
 - 第二节 《呐喊》《彷徨》/45
 - 第三节 《故事新编》/58
- 第四章 20年代新诗/62
 - 第一节 20年代新诗概述/62
 - 第二节 郭沫若/69
 - 第三节 徐志摩 闻一多/73
- 第五章 20年代戏剧/79
 - 第一节 20年代戏剧概述/79
 - 第二节 田汉/88
- 第六章 20年代散文/94
 - 第一节 20年代散文概述/94
 - 第二节 周作人 朱自清 冰心/99
 - 第三节 《野草》/105

目 录

- 文学大事记(1897—1927)/110
- 第七章 30年代文学思潮/120
- 第一节 人文主义文学思潮/121
- 第二节 左翼革命文学思潮/129
- 第八章 30年代小说(一)/142
- 第一节 30年代小说概述/142
- 第二节 丁玲等 /153
- 第三节 新感觉派小说/158
- 第九章 30年代小说(二)/163
- 第一节 老舍的小说创作/163
- 第二节 《骆驼祥子》/169
- 第十章 30年代小说(三)/173
- 第一节 茅盾的小说创作/173
- 第二节 《子夜》/177
- 第十一章 30年代小说(四)/182
- 第一节 巴金的小说创作/182
- 第二节 《激流三部曲》/187
- 第十二章 30年代小说(五)/192
- 第一节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192
- 第二节 《边城》/198
- 第十三章 30年代新诗/201
- 第一节 30年代新诗概述/201
- 第二节 戴望舒 卞之琳/207
- 第十四章 30年代戏剧/215
- 第一节 30年代戏剧概述/215
- 第二节 曹禺与《雷雨》、《日出》等/224

目 录

- 第十五章 30年代散文/238
 - 第一节 30年代散文概述/238
 - 第二节 鲁迅杂文/243
 - 第三节 林语堂 何其芳/247
- 文学大事记(1928—1937)/253
- 第十六章 40年代文学思潮/260
 - 第一节 国统区文学思潮/261
 - 第二节 解放区文学思潮/266
- 第十七章 40年代小说(一)/277
 - 第一节 40年代小说概述/277
 - 第二节 《围城》/288
 - 第三节 张爱玲/290
- 第十八章 40年代小说(二)/294
 - 第一节 现代通俗小说概述/294
 - 第二节 张恨水/297
- 第十九章 40年代小说(三)/306
 - 第一节 解放区小说概述/306
 - 第二节 赵树理 孙犁/310
- 第二十章 40年代新诗/317
 - 第一节 40年代新诗概述/317
 - 第二节 艾青/323
 - 第三节 九叶诗派/328
- 第二十一章 40年代戏剧、散文/334
 - 第一节 40年代戏剧概述/334
 - 第二节 郭沫若的历史剧/343
 - 第三节 40年代散文概述/349
- 文学大事记(1937—1949)/352

导 言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在 20 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文化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现实的、历史的力量,都对文学的现代化发生着影响。这些外因影响着它的萌生、兴起,影响着文学运动、文艺论争、文学创作,造成中国现代文学种种迅速、纷纭的变化,构成了一部能折射历史的方方面面、多姿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自 19 世纪末到 1917 年大张旗鼓的文学革命兴起的近 20 年,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期;有了这个文学现代化发生的先导和基础,才有了五四后 30 年文学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发展。

20 世纪初年,满清王朝覆灭,民国初年政坛剧烈动荡,文化领域尚未出现革命性变化,但是,戊戌变法以至辛亥革命前后,在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激烈的撞击中,中国社会的震荡日益激烈,中华民族被震惊而奋起,启动了的现代化进程已经不可遏止。在政治领域,激烈的社会革命取代了温和的维新,推翻了王朝的世俗政治权力,正在寻求建构自己的合法性,现代民族国家在强权与专制的夹缝中艰难地走向独立的长途;在经济领域,沿海城市在西方世界殖民过程中依靠输入开始了工业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在移植的过程中形成;在社会领域,一方面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传统社会的秩序衰落,新的社会集团与阶层日渐成形;在文化领域,现代进程首先表现为现代文化的生产机制逐步建立,具有现代思想的新型知识阶层逐渐长成并进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① 新型知识阶层利用文学作为政治改良、社会变革工具的功

^① 关于新型知识阶层的兴起,可参见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 1 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上),第 3 章第 4 节,中华书局 1981 年版;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 1995 年版;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 1995 年版。

利主义意识,和以文学为人生的探索、表现,保持文学独立审美价值的纯文学意识,以前所未有的歧异形态构成了中国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的内在张力。文学创作在传统基础上酝酿着重大的改良与革新。

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当然是19—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运动与变革。这是最根本的。但是,什么是推动与贯穿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何种根本性因素激发与规约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纷繁复杂现象与诸种创作方法的更迭和流派的纷呈重组?

社会的文化思潮、哲学思想、美学观念影响了文学的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文学是人学,文学创作的中心任务就是描写人,塑造人物形象,表述我们对人类自我的认识与理解。对人的发现,人对自我的认识、发展与描绘,人对自我发现的对象化,即“人”的观念的演变,是贯穿与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所谓“人”的观念,包括人对自我的认识、人的本质、人性、个人、个性、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地位(以及人生观、人道观、义利观、荣辱观、幸福观、爱情婚姻观、美丑观、友谊观等等)、人的未来与发展等。人类对自我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不断发展、嬗变构成了人类的文明史与人类发展史。人类社会与文明的发展,就是人类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与认识自我的历史,也是人类面对自我如何协调、平衡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之间关系的过程。可以说,整个人类社会与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的观念的演变的历史;我们是什么?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应该是怎样的?我们应如何发展与实现自我?我们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落脚点和归宿。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来指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共产党宣言》同样指出,在未来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人的全面发展”,正是人类的目标。

人类对自我的发现与认识,也决定与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古人对人的发现与认识,决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上古人怀着对自然的恐惧、神秘、崇拜与憧憬,形成了上古时代原始朴素的“天人合一”观,上古神话就反映了上古人对自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憧憬、恐惧与探索。儒家理念以仁为本,“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以人性与伦理道德的协调关系为主体,构建仁、义、礼、智、信等人的行为规范,形成了以封建宗法观念为基础的传统的理性人文主义。老庄主“无知无欲”、“适性逍遥”,以“虚静恬淡”为道德之至。佛家主人生本质乃痛苦说、解脱说、修行说,主“本无”、“无

常”、“性空”，禅宗主张“心性本净”、“万法尽在自心中”。有儒家人学观，就有古代千年繁若星汉的言志抒情之作；有老庄“适性逍遥”、“虚静恬淡”论，就有陶渊明、王维、苏轼、马致远等人的清新脱俗；有禅宗“心性”、“禅悟”说，才有以诗谈禅、以禅趣入诗，才有“妙悟”、“顿悟”、“性灵”、“神韵”说。宋明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明代中叶新的社会发展因素涌动，市民阶层诞生，于是有对人的新的发现。新的人学观质疑、挑战程朱理学，有“天理人欲之辨”。王阳明创心学，提出“心，即是天理”，“良知是尔家的准则”，“致良知”，回到自己的本心。王艮标立心学左派，“人性之体，即是天性之体”，“身与道原是一体”。李贽独创“童心”说，“人道即是天道”，“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萌动于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末的中国反叛的个性主义思潮，激发了中、晚明新的文学观念的发展，和各种新的长篇叙事性文体创作的勃兴。从吴中才子唐伯虎、祝允明的疏狂脱略，徐文长的狂放不羁、为情而作，到公安、竟陵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金圣叹独标“才子书”，力赞《西厢记》为“天地妙文”，从汤显祖尊情抑理的《牡丹亭》、冯梦龙等以“情教”代“礼教”的“三言”、“二拍”，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对人性、人情、人欲、人格的刻画，以及诸多人情、言情、艳情小说的问世，到晚明晚清闲适、人情、香艳小品，乃至沈复《浮生六记》等等，都反映了对人的新发现与文学创作中新的“人”的观念的活跃、涌动。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大裂变，梁启超倡“新民”说。所谓“新民”，就是新的“人”的观念。这是对中国社会现代化与“人”的观念的现代化的呼唤。梁启超的“新民”说剥落了封建君主、宗法家族的囚束，属于国家，属于社会，称为“国民”，所以近代新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尤其注重文学的社会性、政治功利性。

五四文学倡扬个人的旗帜，胡适宣传“易卜生个性主义”，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五四对“人”的个性主义的发现，被学者称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一“人”的观念具有20世纪文化的现代性。在这一人的理念的基础上产生了五四文学的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有《狂人日记》对人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思考，有《阿Q正传》对旧“人”的反思，有《沉沦》中人性的表现，有《女神》青春的放歌，有新月派的人性抒发。

“文学是人学”。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是又一意义层面上的对人的发现。各种创作方法的形成决定于创作主体从何角度发现人、思考人。看重人的社会性、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就形成现实主义；着眼于人的心灵情感的，则倾向于浪漫主义；而认

定人的心灵真实、潜意识的深刻性的,就走向现代主义。这些都包含于“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深刻性中。在中国现代文学百年发展史上,尤见如此。

本书编者认为,文学史,就是在创作主体、创作对象(文学形象)、接受主体(阅读与批评)这三个层面上,实践与表现着对人的不断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由文学如何实践与表现这一不断演变着的“人”的观念,而构成着,丰富着,发展着。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始终贯穿着两种或多种“人”的观念、“人”的声音的对话、交流、对抗、激荡、交融。

1928年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发现了人的阶级性、革命性。这是继由五四发现人的个人性、社会性再向另一端推进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的观念一贯看重人的社会性,看重社会群体与个人发展的关系,这使受西方个性主义思想影响的五四新文化与“人”的观念也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个性主义人学观,五四人学观始终与人的社会性相结合。因此,关注被压迫者和被侮辱者,为被压迫者、被侮辱者的不幸命运与被压迫地位呼喊,这曾是五四“人”的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一关注人的社会性的思想出发,很容易在一部分持激进思想的人士中产生阶级论。在有不同阶层的人存在的社会中,人必然有其阶级性。这是左翼文学对人的新发现,也为中国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视角,展示了一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新的天地。但是阶级性、革命性并不是人的内涵的全部。当然,三四十年代还有茅盾着重人的个性与社会性关系的文学,有巴金、曹禺、沈从文、张爱玲、路翎等各具特点地承传五四个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文学,有老舍、钱钟书等强调人的文化属性的文学。而第三种“人”的观念,就是近现代通俗文学的“人”的观念:充分世俗化中的充分人性化,传统世俗社会的大众道德与大众人性观。

综观“文革”前十七年文学,是多种“人”的观念、人的话语在对抗、冲突、交奏。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指定为唯一的创作方法,阶级的、革命的“人”的观念与话语成为主流,也是十七年文坛唯一的关于人的话语。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连续不断的批判,实现了对五四个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人”的观念与话语的否定。这时期,仍有《我们夫妻之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红豆》、《美丽》、《在悬崖上》、《小巷深处》,有电影戏剧《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第四种剧本”、《茶馆》、《关汉卿》等作品,不绝如缕地发出人性的微弱声音。这声音是微弱的,但也是顽强的。在《百合花》、《青春之歌》、《三家巷》这些革命小说中,“人”的声音也若隐若现。《青

春之歌》中追求个性主义的林道静终于走上革命道路,否定了五四个性主义道路,但是作家以女性的心灵细致地描写了女主人公在人生道路与婚姻问题上的选择,使这部在实质上重返 30 年代“革命 + 恋爱”模式的小说富有人情味与人性美。

在经历了“文革”将文学中的人性赶尽杀绝,以“革命性”、阶级性取代对人的一切描写后,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文化寻根等一系列文学沿革,正是以对人的逐步再发现、五四的“人”的观念的逐步再寻找,而构成新时期文学发展裂变的内在律动。

这种变化又是同外来文化所给予的强烈刺激分不开的。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一个新颖奇异、生机勃勃的西方文化景观展示在中国人面前。自此,中国文化、文学乃至民族心理所发生的巨大裂变,都纠结着外来文化的刺激。西方文化刺激着中国人不断发现人,启发着 20 世纪中国文学如何表现人。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文学进入中国文坛的第一次高潮中,从希腊文学到 19 世纪文学的众多作家被译介到中国,其中最具影响的有四位代表性人物。易卜生在五四高潮时期被《新青年》隆重推出。但是戏剧家易卜生在中国主要是被作为思想家接受的。易卜生的个人主义连同他的《玩偶之家》对于夫权家庭的批判、对于妇女平等自由权利的呼喊,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界倡扬个性主义的旗帜。卢梭是又一位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方人。《忏悔录》从 1928 年至 1945 年间有六种中译本问世。这位启蒙主义思想家袒露自己本来面目的真诚与勇气^①,激动了许多中国人。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叶灵凤、巴金的小说中都有卢梭式的自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中国道德裹挟下的人性是暴风雨般的闪击,使伪道学者感受着作假的困难。尼采,曾在一些激进的文化人中产生共鸣。他那攻击一切偶像与张扬超我的精神,吻合了五四彻底反传统的精神。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也曾在五四小说创作中引起反响,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叶灵凤、茅盾、曹禺、沈从文等人刻画性爱与人物心理都运用了精神分析学理论。

^① 卢梭:“我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卑鄙、邪恶、善良、宽容、高尚,我都如实说出来了。……全能的天主啊!把无数的众生召唤到我身边来吧,让他们听一听我的忏悔吧。……但愿他们之中每一个人,都怀着同样的真诚,敢于在您的宝座前袒露他的内心,然后再看一看,哪一个敢于对你说:‘我比这个人更好。’”(《忏悔录》)

这四位西方人进入当时的中国,对于五四文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们启发中国人重新认识“人”,从四个层次揭示了“人”的内涵。易卜生主义的理性的个人主义,使个人的自由、自尊、人格、人权在理性主义的辉耀下显出耀眼的价值。启蒙主义者卢梭以理性主义思想呈现人性的正负面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使人的真实自我获得了理性主义的确证。尼采则把人的自我张扬到极致,并且颂扬了个人对传统社会的叛逆精神。弗洛伊德通过揭示个人潜意识中涌动着的性欲,挖掘了人的深层意识。易卜生、卢梭所揭示的人,是人类对自我的理性主义认识,尼采、弗洛伊德对人的自我的非理性主义层面的揭示,使人的内涵获得了现代性。这使得五四时期中国文化、文学对于人的发现,构成一个完整丰满的、现代性的人学观。五四文学就是建基于这一新的“人”的观念。鲁迅十分敏感地把握到文学的这一内核,他在五四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中猛烈抨击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明确发出“真的人”的呼喊。

无疑,新时期文学是对“人”的观念的寻找与恢复,“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文化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体现了这种对“人”的观念的寻找、恢复与深入的过程。与这一过程相呼应的,是西方文学的又一次深刻的影响。西方数世纪以来的文学在新时期短短十多年中几乎都曾被介绍到中国,其中影响最大、最广、最深的是西方 20 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尼采、弗洛伊德、贝克特、萨特这四位是对新时期文学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想家。“上帝死了”、“力比多”、“人的荒诞性”、“他人即地狱”、“存在先于本质”的思想观念渗透在最近 20 年的文学创作中。

易卜生、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司汤达等所提倡的传统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已为中国文坛所熟知与普遍接受,而在 20 年代仅为少数激进知识分子所欣赏的尼采、弗洛伊德,在 80 年代再度进入中国时掀起了一阵广泛而经久的热潮。詹姆斯提出的人的意识流理论,伍尔芙、普鲁斯特、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都展示了人的深层意识的空间,这是人类对自我的一次新发现。以卡夫卡、贝克特为代表的荒诞派文学,揭示了人的生存的荒诞性,这是人类对自我处境、人与社会关系的又一次哲学的探询与发现。新时期中国文学、美学的异彩都是汲取了这些异域的养料,共同地体现了对人的发现与重塑。当然,80 年代上半期文学中对人的所谓寻找,仅是对五四时期“人”的观念的恢复和再发现,是将被扼制与摧毁了的“人”的观念、人的形象重塑,它在观念上于五四文学并无特别的发展。曾轰动一时的 80 年代文学,在推动社会变革方面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萨特、海

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80年代末至90年代,“存在主义热”取代了“弗洛伊德热”、“尼采热”。“存在先于时期”、“自由选择”、人的异化、人与社会对立、个人自我的尊严、当代人的失落感、孤独感,这些存在主义思想渗透在9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90年代中国文学重要的现象如私人化写作、女性写作、先锋文学,其哲学观念无不深藏着存在主义。整个90年代中国文学或许尚未产生足以代表这一变动时代的经典杰作,但是其中所体现出的对“人”的新发现、“人”的观念的新发展,却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章

五四文学革命

中国文学在经历了清末民初的现代化发生期以后,自五四文学革命起进入 1917—1949 年的 30 年迅速发展期。这一时期,先导期内的鸳鸯蝴蝶派文学在民间继续大量存在,但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而且随着文学的现代化进程逐渐地被扬弃整合。这一时期内,大致可以以十年为期划分出三个明显的阶段:一、1917—1927 年,以五四为代表的 20 年代文学;二、1928—1937 年,人文主义文学与左翼革命文学并存的 30 年代文学;三、1937—1949 年以全民族的抗战文学为开端以及承续、发展的多地域、多元化的 40 年代文学。

第一节 五四文学革命

发生于 1917 年的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开端。五四文学革命是清末民初 20 年来文学现代化的历史准备的必然,继承了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提倡的“新民”、救国的近代文学改良精神,有着“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与“白话文运动”的基础,且有西方文学的译介(如林译小说)培养成形的对西方新的文学形式的接受心理。

五四文学革命的直接背景和动力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但并未能根除封建主义社会基础,内忧外患使国家和民族陷于垂危。袁世凯阴谋复辟封建帝制,社会上继续推行尊孔读经,旧文化思想仍严重阻碍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受西方新思潮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在历史反思的基础上,备感思想启蒙的迫切。他们利用晚清以来留学生译介的大量的西方文学、哲学、社会学著作,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宝贵的思想资料 and 世界文化交流的参照系,向民众宣扬灌输民主主义思想,抨击封建思想文化,进行比晚清维新派、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派更广泛的思想启蒙,由此而发展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也有利于新文化的生长,如

西方列强正忙于欧战,中国民族工商业有了明显发展,新兴阶级与进步思想同步壮大。

五四时期,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①为主要阵地,兴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又于1919年1月声言《新青年》同人“拥护德谟克拉西(democracy,民主)和赛恩斯(science,科学)两位先生”^②。《新青年》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陈独秀、吴虞、李大钊、鲁迅等各自著文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与三纲五常等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胡适、周作人提出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新青年》大力介绍自由平等学说、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化论,给人们提供思想武器,也赋予文学以精神核心。这个反封建的文化运动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爱国浪潮的推动下,不仅壮大了声势,而且逐渐转换着自身的思想性质,其左翼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并演化为这十年末、下一个十年初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

五四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封建思想的批判必然会转向对封建主义文学的攻击,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成了一场文学革命运动。1917年1月,《新青年》刊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它从“八事”入手,即: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③胡适集中指责旧文学的流弊,初步接触到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学的社会功能、真实性与时代性等一系列“文学上根本问题”。文章正面主张书面语与口头语接近,要求以白话文学为“正宗”,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也是这场革命的第一篇宣言。2月,《新青年》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三大主义”,对整个封建旧文学宣战:“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④他对国风、楚辞直到元曲、明清小说的充分肯定,表明“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的实际意义并非全盘否定古典文学,锋芒仅指向明之前七子及桐城派

①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1916年9月第2卷第1号起改刊名。

②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期(1919年1月)。

③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

④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

的仿古主义。他把文学革命当做“开发文明”、改变“国民性”并借以“革新政治”的“利器”；同时，又认为“文学之为物”有“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答曾毅信），这是对梁启超将文学作为资产阶级政治改良的工具论倾向的反拨。陈独秀把晚清以来的文学改革运动推向了高潮。

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得到了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的响应。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改革韵文、散文和使用标点符号等建设性意见。钱玄同在致《新青年》的信中，从语言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取代文言的历史必然性，并激烈地指斥旧文学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他们俩见文学革命一时不能在思想禁锢的社会中产生广泛反响，便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双簧信”，以引起社会的重视。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仿照旧文人的口吻，汇集反对新文学与白话文的种种观点与言论，写成一封致《新青年》的信；刘半农根据王敬轩的信，逐一辩斥。此举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注意，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新文学摆出了与旧文学对峙的主战姿态。

1918年1月，《新青年》编辑部扩大，自4卷1期起改由陈独秀、钱玄同、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轮流主编；陈独秀又办了《每周评论》杂志；1919年1月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办了《新潮》月刊。这几大刊物一起提倡白话文。一批知识分子形成了新文学的统一战线。新文学阵线内积极开展如何建设新文学的讨论，胡适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4卷4号，1918），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以此为文学革命的宗旨，把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结合起来，其意义超出了文学领域。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从人性、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要求新文学的内容，倡导新文学内容要从“肉”与“灵”的统一中去表现“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①；他在另一篇文章《平民文学》中进而提出“人生的艺术派的主张”，又提出“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②的创作准则。李大钊则提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这样的文学要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作为“土壤根基”。^③一年里，新文学的理论主张有了长足的进展。1919年下半年起，全国白话文报刊风起云涌，据统计达400种之多。到1920年，在

①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

② 仲密（周作人）：《平民文学》，《每周评论》第5号（1919年1月19日）。

③ 守常（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发表于成都《星期日》第26号（1920年1月4日），引自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论选》，第3册，第211—21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白话取代僵化了的文言已成事实的情况下,北洋政府教育部终于承认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① 白话文运动取得胜利。

对于怎样建设新诗、新小说、新戏剧,文学革命的先驱们也进行了探讨。关于新诗的理论文章有胡适的《谈新诗》,俞平伯的《白话诗的三大条件》、《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康白情的《新诗的我见》,周无的《诗的将来》;关于小说,有胡适的《论短篇小说》,周作人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此外,还有刘半农的《诗与小说精神上的革新》,周作人的《美文》等。这些文章注重借鉴外国文学的创作经验,结合新文学的初步实践,对各种文体的革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展望其前途,促进着新文学创作的发展。

文学革命的实绩最主要的还是在于创作。1918年5月,鲁迅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新青年》4卷5号)。它把矛头指向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包涵了巨大的思想革命的现代性内容;形式上的现代性体现则是运用了现代小说的格式与手法。接着,《新青年》、《新潮》、《时事新报》等刊物上又陆续出现了一批新文学作品,小说有鲁迅的《孔乙己》、《药》,叶圣陶的《这也是一个人》,诗歌有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匪徒颂》。这些作品中以刻画普通人的形象、反对封建专制、争取个性解放等新的主题,鲜明地区别于旧文学。胡适、沈尹默、刘半农进行了第一批白话新诗的尝试,有作品《鸽子》、《月夜》、《相隔一层纸》等(《新青年》4卷1号)。1918年5月的《新青年》第4卷第5号正式完全改用了白话。这一时期显示新文学创作实绩的报刊还有《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与京沪四大报纸副刊:北京的《晨报副镌》、《京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文学革命带来文学观念、内容、语言载体、形式各方面全面的革新与解放。文学观念上,文以载道、文笔不分、游戏消遣的传统观念被破除了,借鉴于西方的严肃的文学观念得到了确立。新文学的理论倡导者和实践者对封建思想文化体系的彻底否定改变了文学仿古的风气,表现人生的求真精神

^① 1916年10月,蔡元培、吴稚晖、黎锦熙等发起成立了国语研究会,主张“言文一致”、“国语统一”。1917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3次会议提出了“推行注音字母方案”。1919年4月,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议决拟请教育部推行国语教育办法案、注音字母案和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案。时蔡元培等人在孔德学校自编了白话文国语读本。江苏省不待教育部颁令,便自行通过了《学校用国语教授案》,各学校开始采用国语教材,用白话文进行教学。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下令各省改国文为语体文。同年1月24日,教育部公布修正《国民学校令》,规定将“国文”改为“国语”,国民学校第一、二、三、四年级均学语体文。继之,师范学校、中学校等也采用语体文教学。